

# 概要

## 全球价值链的韧性与重构

本报告发现，尽管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和运行逻辑正随着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但其仍是世界经济的关键支柱。过去二十五年来，中间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将几乎所有经济体都联结进一张紧密的生产关系网络。这些网络在历次危机中展现出相当大的韧性——无论是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冲击、新冠疫情，还是近期频发的与地缘政治和气候相关的扰动。以增加值衡量，跨境生产仍占全球贸易近半壁江山；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的全球价值链数据也显示，中间品贸易名义规模已创历史新高。本报告所汇集的证据清楚表明，全球化正在经历结构性重组，而非被逆转：供应链正通过区域化、数字化和多元化进行适应和调整。这些调整围绕本报告据以进行分析的三大核心维度展开：增强抵御冲击的韧性、扩大对不同经济体与企业的包容性，以及通过技术和政策创新推进可持续发展。

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末期，全球化进入快速扩张阶段，其动力主要来自运输成本下降、贸易自由化以及大型新兴市场的融入。2011至2019年间，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但基于服务和知识流动的新型专业化模式也应运而生。自2020年起，全球化进入第三阶段。企业如今在效率与韧性之间寻求平衡，重新审视供应商集中度，并投资于数字化协调工具以提升运营灵活性。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已趋于平稳，经合组织TiVA最新数据显示，出口中使用进口投入品的比例（即逆向参与度）稳定在出口总额的47%左右，但区域内联系的强度仍在提高，尤以亚洲和北美地区最为明显。这表明，国际生产体在总体上保持延续性的同时，其地理格局正在发生转变。

基于更新的增加值贸易和网络指标，报告发现，亚洲、欧洲和北美的区域枢纽仍占据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大部分份额，而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兴节点相较于主要区域枢纽，在投资与贸易一体化进程中仍处于边缘位置。数字贸易与数据流动已成为助力全球生产网络实现适应性调整而不至碎片化的关键纽带，这对众多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成重大挑战。尽管如此，当前价值链格局呈现出过去二十年来最显著的多极化特征。中国仍是制造业和组装业的核心枢纽，但其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已趋于平稳，产能正向更多经济体扩散。越南、墨西哥、波兰和土耳其在电子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领域扩大了影响力；印度、菲律宾及若干非洲经济体则巩固了其在业务流程与数字服务出口中的地位。这些转变既反映市场力量的作用，也体现了各经济体通过有意识的政策选择以实现风险分散、吸引新投资的努力。目前，服务增加值已占制造业出口中所含增加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凸显设计、物流及数字功能在现代竞争力中的核心作用。

## 弥补结构性与政策性短板，为新参与者打开机遇窗口

全球价值链的重组也具有社会与发展维度。不同地区参与度的分布仍不均衡，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复杂制造业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合计不足5%。物流缺口、有限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工人短缺限制了它们融入高附加值环节。尽管如此，随着企业寻求新的区域供应基地以保障供应安全，机遇也越来越多。拉丁美洲因毗邻北美市场引发在该地区进行近岸化的热潮，非洲则因对关键矿产的需求的增长以及轻制造业的发展，正开辟出新的参与路径。那些将开放政策与制度改革（包括推进现代化海关、改善运输走廊、投资于技能）相结合的经济体，往往能更快地从冲击中复苏，并吸引更可持续的投资。区域分析显示，因毗邻北美市场，拉丁美洲作为近岸化目的地的吸引力再度提升，但一体化程度偏低和物流碎片化仍制约其更深度的参与。非洲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虽仅有小幅增长，但绿色矿产贸易与加工活动正迅猛发展。准备度指标表明，海关效率、宽带接入和技能短缺仍是决定谁能够从多元化中受益的关键因素。本报告强调，韧性与包容性相互强化、互为支撑。出口结构多元化且金融体系健全的经济体，比仅依赖少数商品或买家的经济体更能有效吸收外部冲击。近岸化和区域供应网络有助于扩大参与度，但前提是须得到与之配套的国内政策的支持。若缺乏此类改革，多元化可能只带来溢出效应有限的飞地式发展。诸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和太平洋联盟等区域性倡议，若能使执行力度与政策雄心相匹配，则既可扩大规模，又能加强政策协调。

## 绿色全球价值链的机遇

聚焦电动汽车 (EV) 这一产业，报告强调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转变正创造全新机遇。电动汽车的迅猛崛起正重塑传统全球汽车供应链格局。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产量占全球总量的76.9%，远超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一格局与传统燃油车 (ICEV) 产业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长期由上述三国主导。作为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电池的生产高度依赖矿物资源投入。2023年，全球电池制造消耗了全世界85%的锂、70%的钴以及超过10%的镍。虽然这为资源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在电动汽车供应链中实现产业升级的新机遇，但矿产资源在特定经济体中的高度集中，也使上游环节面临重大脆弱性。因此，对主要电池和整车生产经济体而言，实现关键矿产来源的多元化，正成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优先事项。

电动汽车在全球交通脱碳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新近构建的跨国投入产出模型（该模型将电动汽车与内燃机汽车从更广泛的汽车行业中分离出来）的生命周期评估结果显示，由于电池制造环节的影响，每辆电动汽车在生产过程中比内燃机汽车多排放2至4吨二氧化碳。然而，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电动汽车可实现显著的减排效果。不同经济体中电动车的碳回收期 (carbon payback period) 差异显著：美国为1.7年，中国为5.7年，日本则达7.6年。模拟结果表明，若可再生电力占比和电动驱动效率各提高15%，上述回收期将分别缩短至1.4年、4.5年和5.9年，这凸显了政策干预在加快电动汽车减排效益的释放方面的关键作用。

产品空间分析法 (product space analysis) 是一种用于刻画经济体在原则上从既有产品向更复杂相关产品转型的难易程度的分析方法。该方法揭示, 各国发展电动汽车相关新能力, 大体通过三种路径模式。部分国家采取“突破性”举措, 进军远离现有优势的领域——大型发展中经济体或资源型经济体, 在进入电池加工或上游矿产领域时, 常采用该路径。另一些国家则采取“集群式”路径, 通过增加与现有能力密切相关的电动汽车零部件实现发展; 而“链式”路径则涉及沿供应链逐步升级至相邻功能领域。美国和韩国等发达经济体主要通过集群式和链式路径拓展产业, 深化既有能力; 新兴和资源丰富经济体则更多地依靠突破性发展和早期链式升级, 以期在电动汽车领域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全球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远不止于电动汽车领域。在采用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排放核算框架后, 本报告发现, 2000-2023年间, 发达经济体在生产口径和消费口径二氧化碳排放方面, 均实现了显著且广泛的下降。这种减排不仅体现在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生产活动中, 也体现在出口生产环节。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这些经济体的碳强度已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但减排进程仍持续推进, 反映出排放效率的稳步提升。中低收入经济体所呈现的轨迹则截然不同: 其碳强度降幅有限——2000至2023年间的下降速度仅为发达经济体的60%左右。这些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碳成本尤为引人注目: 2023年, 中等和低收入经济体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参与全球价值链所创造的每1美元增加值, 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发达经济体的3.6至4.7倍。这种差距主要源于能源密集型中间品南南贸易的快速增长, 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它们主要集中在上游环节、制造业占比高和碳排放强度大活动中。这一不断扩大的排放差距, 使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及实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C以内的目标, 面临严峻挑战。

基于得自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排放核算框架的分析结果, 本报告还表明, 全球价值链既深度嵌入国内生产体系, 又依赖跨境生产分工。这种双重结构意味着有效的减排必须同时针对全球价值链的国内和国际环节; 要实现实质性的气候变化减缓需要价值链上所有节点的协同行动。

各国政府已开始通过一系列碳定价工具作出回应——包括碳税、排放交易体系 (ETSs) 和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s), 以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政策。报告强调, 设计合理的国家排放交易体系可在推动全球价值链脱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案例研究的证据表明, 扩大碳定价范围以将更多企业纳入其中, 并改善融资可得性的公平性, 能够在将GDP损失控制在较低水平的同时, 提升排放效率。

通过采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明确区分跨国企业与本土企业生产函数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本报告发现, 若实施时具备足够大的行业覆盖面并保持较高透明度, 碳边境调整措施可通过促使贸易伙伴采用或强化国内碳定价机制, 缓解碳泄漏并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报告同时指出, 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可能对不同经济体及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产生不同影响。报告警告, 碎片化的政策环境可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引入新的监管摩擦。当不同经济体采用不同环境规制, 将使边境调整措施复杂化, 破坏跨司法管辖区经营的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 并催生“监管对冲”策略——即企业调整生产以适应特定市场中的监管要求。

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政策通过影响绿色创新和技术变革，同样塑造着全球价值链。那些激励绿色创新的政策措施——例如研发补贴、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以及市场化运作的奖励低排放技术的政策工具——能够加速企业与产业向绿色技术前沿转型。基于世贸组织环境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逾13,000项环境相关措施——报告指出，随时间推移，此类政策可引发竞争力的结构性转变，使部分国家得以进入环境产品生产的高附加值环节。

金融与技术对绿色全球价值链的支撑作用同样至关重要。当企业能够获得资本并可接收到可靠的市场信号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便能更快采用更清洁、更高效的生产工艺。然而，绿色金融的可获得性仍很不均等。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贸易融资的需大于供，供需缺口超过2.5万亿美元，其中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缺口最大。拓展数字化贸易融资平台、混合融资工具及信用担保机制有助于缩小这一缺口。强化核查标准与完善分类体系，能引导更多资本流向发展中地区的减排项目。

## 技术变革背景下融资与投资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作用

金融与投资联系是全球价值链适应性的基础。拥有可靠融资渠道的企业能更快从冲击中恢复，而吸引多元化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体往往实现更快的技术扩散。然而全球贸易融资缺口依然巨大，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规模较2015年的峰值仍低约15%。这些差距表明，供应链韧性不仅取决于实体供应链的配置，同样高度依赖金融中介功能和投资环境。更一般而言，金融中介与投资分配决定了谁能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这些网络在冲击发生时韧性如何。融资渠道畅通的企业更可能开展出口业务、采用新技术，并在扰动发生后迅速恢复。然而，不同经济体和产业所面临的融资条件仍高度不均等。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企业表示能够获得正规信贷，而持续存在的贸易融资缺口则制约着中间产品出口商的发展。疫情期间，全球银行削减风险敞口，供应链扰动加剧了风险规避情绪，导致该缺口进一步扩大。此后，各开发银行支持的数字化核验平台和担保机制开始弥合缺口，但进展参差不齐。因此，拓展数字化贸易融资生态系统和混合融资工具，对实现包容性的全球化重组至关重要。实证证据表明，外部融资渠道的可及性与生产率增长及出口参与度具有直接关联。信贷渠道更畅通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和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高出40%。然而，融资分配仍高度集中：发展中经济体中，能获得正规信贷的企业不足五分之一。

尽管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但它仍是技术转移和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主要渠道。2023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仍比其在2015年的峰值低约15%，但数字和清洁能源领域的绿地投资项目现已占新公布项目总量的半数以上。这些投资流，既反映了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激励，也体现了国内需求不断增长的大型新兴市场的吸引力。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益高度依赖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在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本充足和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对本土企业的溢出效应显著可测；而在上述条件薄弱的地区，投资可能形成孤立的经济飞地。供应商培育计划、培训合作项目及区域投资协定，均能放大外资对发展的影响。

可持续金融市场正开始将投资决策直接与环境成果挂钩。绿色债券和与可持

续发展相关的债券的累计发行量已突破5万亿美元，ESG导向型基金所管理的资产的规模占全球资产管理总规模的近四分之一。然而，此类融资仍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流向低收入地区的比例不足5%。分类体系与披露规则的差异阻碍了跨境资金流动。因此，推进标准协调统一并提升透明度，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气候转型至关重要。多边开发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可通过分担项目风险、规范报告实践来强化这些努力。由此可见，金融、投资与贸易政策形成有机统一的三元体系：三者分别并共同影响着价值链参与的规模、方向及可持续性。技术与无形资产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力动态。参与全球价值链仍是知识扩散和干中学的最有力机制之一。企业层面的数据证实，与未参与的企业相比，后向参与每年可使企业的生产率每年提升2至5个百分点，在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效果最为显著。在许多产业，对软件、数据及组织诀窍的投资已超过在实物资本上的支出，推动价值创造重心向知识密集型活动转移。东亚与东欧地区将职业教育和中小企业辅导项目同跨国网络相衔接的实践，生动展示了如何通过国内能力建设，将开放转化为广泛的收益。那些将引进技术与本土能力相结合的企业，其产出和工资增长往往更为迅猛。然而，这些收益的分配并不均衡。在数字连接薄弱或融资渠道受限的经济体中，众多中小企业仍被困在低生产率环节。加强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数字技能培训规模、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是将全球价值链参与转化为生产率提升的关键条件。

无形资产——包括软件、数据、知识产权和组织诀窍——已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在制造业中，许多发达经济体中对无形资产的投资现已超过对机器设备和建筑物的支出。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比率较高的企业，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韧性，因为这些资产在冲击发生时能够快速重组。这一变化对传统贸易统计提出挑战，因为当前相当一部分价值是经由知识产权特许使用费和数字服务，而非通过实物商品实现跨境流动。对无形资产流动进行准确测度，将成为理解未来竞争力的关键。

技术升级同样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和包容性。全球化在出口部门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优薪工作岗位，但自动化和数字化正在改变就业结构：常规性岗位持续减少，而对技术型、管理型及服务导向型技能的需求则日益增长。若缺乏配套的教育和培训政策，数字化转型可能扩大经济体内部及经济体之间的不平等。报告重点介绍了东亚和东欧地区的项目实践，这些地方通过职业培训、中小企业辅导和创新中心建设等项目，成功使本土企业接入国际生产网络。这些实例表明，将对外开放与国内能力建设相结合，仍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最有效路径。

## 调整治理方式以适应全球价值链重构

全球化的制度架构正与生产与金融一起重组，其背后的推动了来自两种互补却迥异的治理变化：产业政策的复兴与定向贸易协议的激增。这两种变化均反映出各国政府正在努力应对同一组结构性压力——包括气候变化紧迫性、技术竞争以及地缘政治紧张等——的同时，仍致力于维护经济开放带来的益处。理解这些治理工具如何相互作用，并确保其透明度与协调性，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管理的核心议题。

产业政策已重新成为新的全球经济的标志性特征。各国政府正通过补贴、税收激励、监管性要求和公共采购等政策工具，加速技术转型并强化战略性产业的国内产能。自2020年以来，主要经济体已宣布的产业政策计划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集中于半导体、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支撑这些领域所需的上游投入品——如关键矿产和电池组件。这些干预措施旨在增强韧性、实现气候目标以及确保技术领先地位，但同时也模糊了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的界限。产业政策的这一轮复兴由三方面的力量共同推动：气候承诺与技术竞争，促使各国政府直接介入创新体系的塑造；安全关切推动关键供应链的“去风险化”；以及维持制造业就业的国内压力重新上升。

实证证据表明，多数补贴集中于绿色技术领域的上游投入——电池、可再生能源组件、先进半导体及清洁氢能——在这些领域，公共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址决策，并塑造了全球投资的分配。产业政策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的扩散，反映了一种结构性转变，即国家在塑造生产布局中的作用正日益增强。然而，缺乏协调的干预措施可能导致重复建设与补贴竞赛，从而削弱效率。重叠的支持措施已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投资竞赛和成本水平。报告提出了一个透明度框架，从政策意图、规模及跨境影响等三个维度，对产业政策工具进行评估。通过国际机构加强政策通报与同行评议，既可使各国的政策计划与脱碳、包容性增长等集体目标保持一致，又能将以气候减缓、供应链韧性为代表的正当公共产品目标，与保护主义的扭曲性干预区别开来。

传统的多边谈判进程业已放缓，这促使各国政府尝试采用更灵活的治理工具。定向贸易协议（TTDs）的兴起——这类协议通常具有行业专属性或范围限定性，专注于应对监管壁垒——正是对推动产业政策的同一组结构性压力所作出的互补性治理回应。截至2024年底，仅在数字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已签署的定向贸易协议就已超过185项。自2019年以来，通过数字贸易定向贸易协议建立联系的经济体组合的数量增长了30倍以上，而所有与矿产相关的协议中，约有80%签署于2022年之后。在多边规则尚不完善或已显过时的领域，如数据流动、数字服务、人工智能治理和关键原材料获取等，这些工具使有关各方实现快速、针对特定议题的合作。与传统贸易协议不同，定向贸易协议强调通过磋商机制、知识共享和联合标准制定开展监管合作，这反映出国际贸易治理的重心，正从关税自由化转向对非关税监管摩擦的管理。

产业政策与定向贸易协议的相互作用，正日益成为塑造供应链演变的重要因素。产业补贴、本地成分规则以及与监管相关的激励措施，往往与定向贸易框架相互交织，共同决定着投资地点、技术转移模式及采购策略。例如，为保障锂、钴及稀土供应而签署的关键矿产定向贸易协议，直接与那些对电池制造和电动汽车组装进行补贴的产业政策相互作用。类似地，旨在建立数据治理框架的数字定向贸易协议，也与支持国内云基础设施、半导体生产及人工智能发展的产业政策形成交互。这种政策空间的重叠，既为形成协调一致的战略提供了机遇，也可能因措施衔接不当而带来政策碎片化风险。

上述两个领域的透明度对建立信任和实现有效协调至关重要。由于多数定向贸易协议在立法监督之外谈判达成，且极少向世贸组织通报，因而受公众审视的程度有限。产业补贴同样存在通报不足和信息披露不完整的问题，使贸易伙

伴难以评估其规模、意图及其对竞争的影响。建立定向贸易协议的信息集中平台，并提升产业政策数据的可比性，有助于强化问责机制，并有助于将合作性措施与扭曲竞争的措施区分开来。

国际机构加强数据收集的工作——基于诸如联合补贴平台 (Joint Subsidy Platform) 和世贸组织的补贴政策主题分类梳理 (thematic mapping) 等此类倡议——有助于推动同行审议，缓解因不公平感而引发的紧张关系。关于支持措施的意图与规模的更为充分的信息，将有助于各国更好地评估干预措施是否符合脱碳和增强韧性等共同目标，抑或存在引发报复循环的风险。

初步证据表明，即使不具约束力，定向贸易协议仍可影响贸易流向和投资决策。关键矿产领域的双边安排，使相关伙伴间的贸易额提高了约12%，而包含互操作性条款的数字贸易框架，则推动参与经济体跨境服务规模的扩大。因而，定向贸易协议的灵活性既带来机遇，也伴随风险。若缺乏协调，重叠的规则可导致全球贸易体系的碎片化；但若嵌入透明的报告与对话机制之中，则可成为多边框架的有益补充。同样的逻辑亦适用于产业政策：透明且协调的补贴能纠正市场失灵并加速绿色转型；而不透明且重复叠加的补贴则可能引发补贴竞赛，削弱集体福利。从整体来看，产业政策的复兴与定向贸易协议的激增，体现的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重组而非瓦解。这两种政策工具都体现了在竞争加剧、多极化加深的世界中，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竞争、供应链脆弱性等紧迫挑战所做的务实努力。其成效取决于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互补性与内在张力。各国政府必须在实现国家目标与获取政策协调收益之间寻求平衡。透明度、措施可比性、同行评议和包容性对话，是确保这一新治理架构能够支持而非削弱全球化重组的制度基础。多边论坛在共享证据、化解分歧、防止灵活性不致演变为碎片化等方面，仍不可或缺。区域和诸边倡议可作为新规则的试验场，前提是其经验教训能够被系统总结，并有效反馈至一个协调一致的全球框架之中。

## 三个主要结论

综合来看，报告的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化正进入新的结构性均衡状态，而非走向瓦解。区域化、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是该阶段的核心特征。生产活动仍具全球规模，但日益通过相互重叠的区域网络来组织，且是由更多元化的规则体系与制度框架来治理。在此环境中取得成功，取决于经济体的适应、创新以及协作的能力。拓展参与度、管控风险、降低环境影响的政策，构成了本报告所称的“全球化重组”的基础。

报告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全球化必须更具包容性。扩大发展中经济体和小企业获取金融、技术和市场的渠道至关重要。数字贸易平台、贸易融资倡议和区域一体化计划有助于降低进入壁垒。多边机构提供的能力建设支持，应聚焦物流、海关现代化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准备度。

其次，全球化必须更具韧性。多样化采购来源、透明的供应链结构，以及稳健的宏观金融框架有助于经济体更有效地抵御冲击。各国政府应鼓励公私部

门间的信息共享，以预判供应链中的扰动。区域性应急安排——包括必需品的储备合作或互助机制——可进一步增强稳定性。金融韧性同样至关重要：维持稳定的资本流动和审慎的债务管理，可避免损害贸易和投资的突发性逆转。

第三，全球化必须朝着可持续方向推进。气候政策与贸易政策须相互协调，以使减排和竞争力相互强化。碳核算标准的完善、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以及对循环经济实践的支持，可在不抑制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减轻环境压力。在碳定价和边境调整机制方面加强国际协调，对于防止市场碎片化至关重要。发展中经济体需要获得气候融资和技术，才能平等参与这场绿色转型。除上述优先事项外，在全球经济合作中重建信任同样是一项关键任务。产业政策与气候政策的透明度、跨经济体数据的可比性，以及政府与国际机构之间持续有效的沟通，都是维系各方对开放市场信心的必要条件。即便协议的形式和内容日益多样化，在分享证据、化解分歧方面，多边论坛仍然不可或缺。区域性与诸边倡议可作为新规则的试验场，前提是其经验教训能够被系统总结，并有效反馈至一个协调一致的全球框架之中。

本报告使用的数据和证据主要涵盖截至2024年底的时期，而2025年对全球贸易合作而言，又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平均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已升至数十年来的高位，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激增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具有扭曲性。尽管如此，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测显示，贸易增长依然强劲。这印证了本报告的核心结论：得益于企业灵活的应变能力，以及各经济体管理扰动的创新性政策措施，供应链总体上仍具韧性。然而，2025年的发展也清楚表明，为持续维护国际贸易带来的收益，在全球经济合作中重建信任，已变得愈发迫切。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5》延续了始于2017年的关于全球价值链与发展的系列研究，此前的各期报告，已讨论了技术、韧性与包容性等主题。本期报告将这些主题置于后疫情时代、数字互联且受气候约束的世界格局中加以审视。报告传达的核心信息是一种务实的乐观主义：全球生产体系正在重组，而非倒退。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关键任务，是驾驭相互依存关系，以推动实现包容、有韧性且可持续的繁荣。

(黄绍鹏 译)